

中国文化对朝鲜朝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孙惠欣*

【摘要】 由于朝鲜与中国地理上唇齿相依,文化上血脉相连,几千年来,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并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在朝鲜古代小说中,以梦为素材,或者以梦幻构造为根基的作品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梦字类汉文小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这类小说在心态文化、制度文化、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朝鲜民族对其的看法、取舍、评价及再创造,了解朝鲜民族的审美心理及其特征,这对正确把握朝鲜半岛汉文学的文化特征、所蕴含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中国;文化;朝鲜;梦字类汉文小说;接受;影响

以梦为素材,或者以梦幻构造为根基的作品在朝鲜古代小说中占据了不小的比重,特别是近年来文坛对《九云梦》、《玉楼梦》等长篇梦游梦幻小说的关注,再次引起学者对这类小说评论的兴趣。“梦游小说作为一种记录梦中故事的文学形式,需要有特征明显的入梦和梦醒部分及完整的梦中事件。”^①梦字类小说是梦游梦幻小说中的一个部分,产生于17世纪,是在前期梦游录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梦游录相比,梦字类小说更细腻地体现当时朝鲜文人的境遇,也标志朝鲜朝汉文小说文学形态的成熟。主要作品有金万重的《九云梦》、南永鲁的《玉楼梦》、李庭绰的《玉麟梦》以及作者不详的《玉仙梦》等。

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看,文化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也称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②。从物态文化层面上考虑,中国和朝鲜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文化阶段,是东北亚众多民族和国家中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两个民族和国家。这种物态文化层面上的相通性,为朝鲜接受中国文化因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中国周边的民族和国家中,朝鲜在接受中国文化方面最为积极主动。而这种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接受,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正如《文学批评用语辞典》中评价的那样:一个文本不是封闭的空间,而是同文化的其他文本息息相通、相互联贯的开放的空间。因此,文化既是被组织起来的意义系统,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符号系统。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文学文本,与作为一个大符号系统的文化文本相比,只是一个子系统而已。只有把文学文本放在文化

* 孙惠欣,文学博士,延边大学中文系教授,133002。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古代文学交流研究”(13BZW097)、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吉教科字[2008]16号)的中期成果。

① 孙惠欣:《朝鲜古代梦游录小说探源》,《社科学战线》2012年第7期。

② 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文本之中去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社会文化意蕴^①。下面从心态文化、制度文化、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论述中国文化对朝鲜梦字类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对中国心态文化的信奉与坚守

几千年来,朝鲜接受中国文化是全方位的,其中通常所说的“文物制度”,即心态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心态文化方面,几千年来,朝鲜历时性地接受了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但在整体上看,儒家思想对朝鲜古代思想的建构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得到朝鲜古代国家的承认“是从高句丽小兽林王(公元371~384年)时期开始的。小兽林王二年,建立了儒学教育机关‘太学’,把五经和三史(按指《史记》、《汉书》、《晋春秋》)规定为教科书。”^②到了朝鲜朝建国初期,儒家思想成了朝鲜的指导理念,统治朝鲜朝500多年。佛教、道教一般认为是从三国时代传入朝鲜的,佛教到了高丽时期达到鼎盛,成为国教。但到了高丽末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东渐,儒学在朝鲜思想结构中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佛教退居其次。相对于儒教、佛教,道教在朝鲜的影响力相对弱一些。道教虽在朝鲜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未形成庞大的道教集团,也未成为国教。在朝鲜朝时期,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所以道佛思想自然处于次要的地位,佛教甚至受到官方的排挤和迫害而退居山林。然而道佛思想仍然作为一股强劲的暗流,流淌在朝鲜思想史的河床底下。因此,道佛思想也仍然对朝鲜古代小说(包括梦字类小说)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包括心态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最重要的传承媒体是语言文字。古朝鲜人民长期接受并使用汉文汉字,以至于汉文汉字成为官方语言,对朝鲜社会、教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口头语的朝鲜语与作为书面语的汉文并行不悖,长达几千年,这在世界人类语言史上也是一大奇观。这种长期的双语文化现象,必然导致朝鲜文文学与汉文文学长期共生共存。而汉文学在整个朝鲜古代文学的系统中,与朝鲜文文学平起平坐,甚至超越朝鲜文文学而君临所有文学之上。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出现思想艺术水平都很高的汉文小说是顺理成章的,而梦字类小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心态文化对梦字类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积极的入世上。传统儒家认为,家与国是紧密相联的,“家”被看成是“国之本”。“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点,且修身的最先处所、影响效力最大的处所,即在于家庭,故而在儒家想中,家庭教育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③当一个人修身齐家之后,就要积极入世,投身于仕途,实现个人抱负与为国效力的双重价值。《九云梦》开篇中性真萌动尘念之时就表明了这种心态,他认为文人墨客的理想就是成功名、享富贵、近美色,“出则作三军之帅,入则为百揆之长”,“目见妖艳之色,耳听幻妙之音,荣辉极于当代,功名垂于后世”。杨少游的一生也正是遵循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作者将自己所憧憬的“尧舜之君”政治理想,通过杨少游荣华富贵的一生得到实现。《玉楼梦》中的杨昌曲,在新天子即位广招天下英才之时,则明显表露出“事君泽民”、“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的积极入世理想。《玉仙梦》中的许巨通,不满于“海隅偏邦”的处境,而期待自己若能在“中华广宥之地”,必将“激昂万乘之主,出入九棘之班,饫吃许多苦乐,然后死无所憾矣”,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也正是因为许巨通有如此志向和入世的理想,使得他在入梦后以主人公钱梦玉的角色完成了作为一个儒生的人生愿望。中朝两国交往频繁,思想文化交流更是深入,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是深深融入朝鲜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民族儒学。

①李相涉编:《文学批评用语辞典》,首尔:民音社,2003年,第160-162页。

②金京振:《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

③潘万木、李孝华、上官政洪主编:《简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朝鲜人始终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伦理、道德神志宗教来信奉,并且表现的比中国人还要坚定。”^①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梦字类汉文小说中主人公们无一不想通过文章功名来成就一番伟业。“‘文章功名’这四个字非常扼要地概括出了朝鲜朝时期读书人的价值观,通过文章来谋取功名是每个朝鲜朝时期读书人的崇高人生理想”^②。

其次,表现在消极的出世上。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士大夫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经历多种磨难,有的甚至一生都无法实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仕途受阻,人生不得志之时,他们往往需要佛家的与世无争、道家的清静无为来填补空虚的心灵。《九云梦》中的杨少游,集文章功名,荣华富贵于一身,实现了封建士大夫所希求的人生目标。尽管如此,作品中还不时流露出一种“福满祸生”的担忧。在“杨元帅偷闲叩禅扉,兰公主微服访闺秀”中,杨少游叹息道:“积苦兵间,弊情劳神,此身尘缘,何太重耶?安得功成身退,超然物外之人也?”在这里杨少游已经开始意识到世间荣华的转瞬即逝,已经开始有归去隐退之心了。作品结尾处,在人生荣耀达顶峰之际,壮年之身的杨少游毅然辞官下野,脱离尘世之纷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朝廷瞬息万变政治形势的一种担忧。在激烈的党争中主人公不仅发出“高台自倾,曲池且湮。今日歌殿舞榭,复作衰草寒烟”的感悟,表现出对盛极必衰的一种忧虑。也正因如此,杨少游最终选择了退出江湖,皈依佛门。《玉麟梦》中范璟文被柳原从契丹救回后,他于国于家都未尽到封建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出使契丹谈和失败被囚禁多年,使他治国的愿望化为泡影,而家门内部妻妾矛盾使他齐家的愿望未能顺利实现。“治国”、“齐家”的挫败,没有实现范璟文的入世愿望,继而他选择远离官场,消极出世。同样选择退隐的还有《玉仙梦》中的钱梦玉,作品结尾处,北虏入侵,皇帝更迭频繁,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此时的钱梦玉“心如中酒,渐忘世间许多悲欢”,已经看破世间功名的他上表请辞。辞官后归投灵隐寺,广修道法。仕途之路坎坷不平,再加之政局动荡变幻,人事浮沉,大多数士大夫不免偃蹇一生,不能出人头地。近乎本能的出世欲望却依然在,时时撞击心灵,使他们的内心隐隐作痛。这时就需要道教的虚幻来抚平他们的伤口,在道教成仙、成神纺织的世界里,只有出世归隐,才能明哲保身。

再次表现在不灭的轮回上。佛教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思想既与道家的安处时顺、无为不争态度相互沟通,又与儒家顺应时势、安贫乐道的思想相互联系。历史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每当士大夫们仕途落魄抑或官场不得志之时,往往投入“自然”的怀抱,吟诗作画,躬耕田野。每当士大夫们享尽人间功名富贵到了晚年,又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常与虚无,皈依佛门。《九云梦》便体现了佛教的轮回观。小说主人公性真和他的八个妻妾原本都是天界的人物,被贬凡间后,性真投生为秀州县杨处士之子杨少游,杨少游领着三妻五妾,富贵功名盛极一世,享尽人间欢乐。到了晚年,谈论人间无常与虚无,顿悟修禅,重归天界。《玉楼梦》也是如此。文昌星和五仙女被谪降人间。文昌星转世托生为杨昌曲,与二妻三妾,享受人间富贵荣华,当缘分已尽时重新回归天上,继续去做他的仙官。在第六十四回中,江南红做了一梦,梦到南海观音菩萨点化她们乃是天界星宿,轮回人间尘缘一番后必将归位。这个梦暗示了他们仙凡两界的轮回。除了轮回观,梦字类小说中还体现了佛教的善恶观,如碧城仙、柳氏最终的沉冤得雪,黄氏、吕氏的罪有应得,弃恶从善等。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朝鲜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心理结构或思想结构,与中国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别无二致,一般都持儒家的生活态度。但在落魄失意之时,往往采取避世隐遁、徜徉于山水间的道家的生活态度。从这几部小说思想结构来看,尽管作为思想背景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佛道思想因素所占比重较少,而贯穿其始终的思想则是儒家思想。杨少游、范璟文、杨昌曲等

^①卞良君、孙惠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对古代朝鲜梦游录创作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4期。

^②孙惠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完全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佛道思想除了在首尾出现以外,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是作为一种战争中的手段——魔法、道术而出现的,在人物性格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正如学者所云:“《九云梦》中享尽荣华富贵的贵族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实质上是躲避党争之祸。《玉楼梦》则进了一步,摒弃了这种涂上宗教色彩的借口,直接提出:盛满太过,必遭小人之忌,不如功成身退。现实得多,也坦率得多了。”^①

二、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就制度文化的结构而言,包括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科举制度等等。朝鲜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接受。长期以来,朝鲜与中国在政治上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在“天朝礼治”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之下,朝鲜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力求仿效中国,比如在朝廷上君臣关系、行政区划、官衙的设置等无不受中国的影响;二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接受。自中国隋唐以来建立科举制度,实行“以诗文取士”的选官制度以来,朝鲜统一新罗时期就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开设了“读书三品科”^②,这是朝鲜科举制度的雏形。到了高丽光宗时期,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科举制度。到了朝鲜朝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成为唯一的选官制度,对社会、教育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尤其对读书人价值观的形成。这自然反映到整个朝鲜古代文学中,作为儒生个体意识载体的梦字类小说更是这样;三是对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接受。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朝鲜的婚姻家庭制度固然同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关,但主要还是在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下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例如,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朝鲜朝时期的家长制,以及支撑这种家长制的“孝”以及“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等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都可以说是长期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婚姻家庭制度影响的结果,由此衍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文化就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中也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在梦字类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文化对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士大夫的齐家理念上。传统儒家认为,家与国是紧密相联的,“家”被看成是“国之根本”。古代中国浓厚的家庭观念是儒家体系构成的一部分。“作为家庭关系体现的男女、夫妇、父子被看成社会的基础,没有他们,君臣、国家、礼义就无从谈起,因而治理家庭成为治理国家的起点。”^③古人把“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将构建“和谐家庭”看作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古代朝鲜家庭社会,男性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他们贯彻“三纲五常”甚至比中国还要彻底和完全。“以‘夫为妻纲’引申出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观念;以‘三从四德’引申出为夫守节、从一而终的观念,并将女子为夫守节列入国法。在朝鲜朝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生存权,她们往往是被视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因而在朝鲜的男权社会中很多小说都充斥着男权思想。”^④《玉楼梦》中的杨昌曲作为一家之长,不仅肩负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还承担着齐家这一重要家庭责任。他的齐家能力,主要通过解决妻妾矛盾展现出来的。妻妾争斗的圆满解决,最终大团圆的结局,都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和在齐家方

^① 韦旭昇:《韦旭昇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② “读书三品科”是新罗时期选用官员的方法,也称读书出身科,公元788年设立其考试内容是《曲礼》、《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等。

^③ 雷家宏:《中国古代家庭观念论述》,《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④ 孙惠欣:《论朝鲜朝梦游录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近代因素》,《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

面的卓越才能。作为“治国”能力的补充,其“齐家”本领恰恰使这个人物更加全面,成为一个完全符合儒家思想体系的完美形象。《玉麟梦》中范璟文,在整个家庭当中,既担任长子角色又担任丈夫角色,在整个家庭关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所有家庭活动均围绕他展开。具有皇亲国戚强大背景的吕氏几度陷害大夫人柳氏,范璟文由最初的不相信到之后放任的态度,以致柳氏多次遭陷害,几近丧命。范璟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但其在“齐家”过程中的善恶不分却间接导致了柳氏的不幸。尽管如此,作品中并没有去谴责他,而把一切归咎于心狠手毒的吕氏,范璟文家庭中心地位也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动摇,他依旧是家庭的主宰,妻妾的中心。

其次,表现在对一夫多妻制的赞成上。朝鲜朝时期奉行一夫多妻制,等级森严,两班贵族不能与中人、平民或贱民结为夫妻,所以江南红、碧城仙、狄惊鸿、一枝莲等无论多么相貌出众、才智过人,但因其身份低贱,不能为妻,仅能退居为妾,封建社会身份等级制度造就了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九云梦》作者竭力颂扬一夫多妻制,杨少游的三妻五妾相处得相当和谐。作品中对妻妾之间的互相争宠只字未提,而展现的全是妻妾之间的宽宏大度,温和谦逊、和睦相处。杨少游上京赶考路途中与洛阳名妓桂蟾月一见钟情,但云雨过后她竟把好友狄惊鸿引荐给杨少游为妾。《玉楼梦》中则反复强调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融洽与和睦,杨昌曲有二妻三妾,众妻妾间不但没有妒意,而且相互引荐,为丈夫多求如意女子。爱情本身就具有排他性,而《玉楼梦》中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贵族家庭,则要求完全摒弃女子之间的这种排他性。“这种写法充分表现出来作者是以封建贵族社会家庭的婚姻体制为标准来塑造其理想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爱情生活”^①。尽管如此,《玉楼梦》也表现出它积极的一面,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表现出与传统相左的态度,即表现出封建社会晚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感情追求和思想倾向。作品中尽情讴歌了杨的三位小妾,使两位望族出身的夫人失却光彩,相形见绌。尤其是江南红,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杨昌曲毕生的赫赫功名。另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杨的三妾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主性,与封建社会倡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封建社会晚期新兴市民阶层打破封建门阀制度及身份制度束缚的要求。与《玉楼梦》相比,《玉麟梦》则更具有进步性。作品以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下,因女性的嫉妒与猜忌所引发的家庭矛盾纠纷为主要内容,用大量的笔墨对妻妾矛盾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吕氏对柳氏的嫉妒和迫害成为作品描写的主线。吕氏从开始设局骗薛秀才汗衫,模仿薛秀才笔迹,再到假药丸事件,收买丫鬟春娇,一步一步将柳氏推向百口莫辩的深渊。作品对家庭妻妾矛盾的揭示,体现出作者对一夫多妻制危害的认识,这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在经历一番妻妾矛盾重重纠葛后,作品最终还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这又体现出作者创作的局限性。

一夫多妻制是配合宗法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的优越主导地位而出现的,是男性利益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妻和妾都被编制在以“共同的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网络中,为了得到丈夫的宠爱和家庭地位而不惜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破坏了婚姻结构的平衡性。

三、结语

梦字类汉文小说在心态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在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比较突出。朝鲜古代小说有一大特点,即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颇多,并借用中国的地名、人名、时代名、官职名等。《九云梦》以中国唐代为背景,《玉麟梦》以宋代为背景,《玉

^① 韦旭昇:《韦旭昇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

楼梦》、《玉仙梦》以明代为背景。在《玉麟梦》中出现中国古代地名及山水名胜达上百次之多,如南昌府、咸阳、沧州、洛阳、云南、北海、玉华山、天台山、三峡、鄱阳湖等。《玉楼梦》中出现中国地名也是俯拾皆是,官职名就更不用说了。同时还出现了像花果山、清风洞、黑风山、太乙洞等《西游记》中的虚构名称,足见朝鲜文人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小说文化的熟悉与认同。梦字类小说之所以选择中国为背景,主要是因为朝鲜古代文人醉心于中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结果自然会赞美其文明,而对中国产生憧憬。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朝政治腐败,党争不断,文人们不敢正面揭露朝廷的腐朽和黑暗,借用中国时代背景,采用梦幻结构,则达到既可避祸又可表达胸臆的功用。这也正是梦字类汉文小说在朝鲜朝时期兴盛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原高丽大学教授韩升洙曾指出:“过去,东方人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和北方民族对峙的历史。朝鲜民族从血统上讲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文化上讲,它又始终和中华民族密切交流。”^①总之,从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对中国心态文化、制度文化、历史地理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能够比较具体而清晰地看到朝鲜与中国古代文化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由于历史的安排与作用,使得朝鲜与中国既在地理上唇齿相依,更在文化上血脉相连,一致的东西多而不同的地方少。通过对梦字类小说的分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朝鲜的接受程度,这对正确把握朝鲜半岛汉文学的文化特征、社会理想和审美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源于朝鲜民族热情、奔放、刚强的性格,在梦字类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反映抵抗外族入侵、反对强暴的情节,这些都表现出朝鲜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面对列强非同寻常的、拒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陆 林)

Chinese Culture's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Mongcha Group of Chosun Dynasty

SUN Hui-xin

Abstract: Korea and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Chinese culture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Korea, and this is well reflected in ancient Korean literary creation. In Korean literature, there are a lot of novels drawing materials from dreams or based on dreams, of which Mongcha Group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This sort of novels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in ideology, instituti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From these novels, we can see how Chinese culture was accepted by Korean people and understand their unique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 peninsula literature, its social ideal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hina; culture; Chosun Dynasty; Mongcha Group; adoption; impact

^①金京振:《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第253-254页。